

doi: 10.3969/j.issn.1673-2006.2013.06.011

明清徽州人才的兴盛及其原因探析

张晓婧^{1,2}

1.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2.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 安徽蚌埠, 233030

摘要: 梳理了明清徽州地区各种人才的类型, 各类人才按照不同行业, 可以划分为科举人才、商业人才、学术人才、医学人才、艺术人才等。各类人才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各种人才群体, 如徽州商帮、新安理学家、皖派朴学家、新安医学家、徽派画家等。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 明清徽州的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明清徽州能够产生众多人才的深层原因有三: 一是徽州宗族提供组织保证; 二是徽商群体提供经济基础; 三是徽州教育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明清徽州; 人才类型; 人才兴盛; 宗教组织; 徽商群体; 徽州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06(2013)06-0037-04

明清时期的徽州除了享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 同时创造出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灿烂的徽州文化向人们展示了明清徽州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的高度统一和协调发展, 如徽州商帮、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村落、徽州篆刻、徽州建筑等, 令人瞩目。明清徽州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除了中原文化是其基因, “徽商”之作为酵母, 还与徽州各类人才的贡献息息相关。本文梳理了徽州地区的各类人才及其成就, 重点探讨明清徽州人才兴盛的原因, 以期对当今社会人才培养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明清徽州各类人才的兴盛

“人才”的含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要给“人才”概念以科学的概括, 人们的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不同的行业对人才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 关于衡量人才的标准, 有的以智商高低为标准, 有的以杰出程度为标

准, 有的以创造价值为标准等。现代版的《辞海》认为: “人才是指有才识学问的人, 德才兼备的人。”^[1]《辞源》的解释更为简洁明了, 认为: “人才是指有才学的人。”^[2]其实, 对于人才这个概念, 上述两种解释已经足够, 人才就是“德才兼备”或者“有才学”的人。如果按照此标准来划分, 明清时期徽州的人才群体主要分为科举人才、商业人才、学术人才、医学人才等。

自唐宋以来, 科举制度成为国家遴选人才的主要途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是士子们寒窗苦读的动力与目标。在科举制的激励下, 涌现出众多的科举人才。正如近人黄轶球指出: “(科举制度)一直到清朝为止, 它都是统治者笼络读书人唯一的重要工具。因而一地的文运兴衰, 人才的质量高下, 都与科举有不可分离的关系。”^[3]明清时期, 徽州地区的科举人才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 可谓极盛。据徽州方志的不完全统计, 明代徽州有文进士446人、武进士50人, 文举人1237人、武举人170人; 清代徽州有文进士

收稿日期: 2013-04-08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经济和文化的互动: 基于徽商与徽州教育经济变迁的研究”(2011SQRW05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化进程中区域教育的嬗变”(AHSK11-12D25)。

作者简介: 张晓婧(1981-), 女, 安徽凤阳人, 在读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史、徽学。

[19] [2012-10-21].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7/19/content_2763481.htm

[9]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2-11-08(1)

[10] 亨廷顿. 难以抉择: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 汪晓寿, 吴志华, 项继权,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1] 武月锋. 建国以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范式转换及态势展望[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30(4): 43-47

[12] 佚名. 因不满食堂服务质量, 千余大学生互发短信罢吃[EB/OL]. (2003-12-16) [2012-02-25]. <http://news.qq.com/a/20031216/000063.htm>.

(责任编辑: 周博)

664人、武进士100人、文举人2067人、武举人312人^{[4]276}。把明清徽州进士人才数量放置全国大背景下,即可看出其科名之盛。范金明先生统计,明清两代共录取进士51681人次,其中,明代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5]。据此计算,徽州府占全国比例为2.11%,明代占全国1.86%,清代占全国的2.48%。沈登苗先生曾统计出明清全国进士的数量和地理分布,在其统计数据中,明清两代全国进士最多的46个城市中,徽州府位居第15位^[6],排名较前,在安徽省更是独占鳌头。

明清全国最著名的地域人群首推“徽州商帮”。徽商群体的出现,本身就足以证明徽州地区商业人才的发达。至清代前期,徽商的势力达到巅峰,尤其在盐业方面,出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的盛况。作为商业人才的群体,他们闻名海内;作为个案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中又涌现出诸如两淮总商鲍志道、墨业巨商胡开文、“布衣上交天子”的大盐商江春以及歙县江氏茶商家族等。除了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他们与其他商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亦商亦儒。晋商是明清时期可与徽商相抗衡的唯一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7]但是,两者相比较而言,徽州的商业人才更是全面发展。虽然两大商帮在商业上均是精英辈出,但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徽州商帮衰落了,他们支持的文化事业却成了今天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尤其是他们培养的一代代文化精英及其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晋商衰落后,除了梆子戏和本身创造的商业经验外,其他文化事业上的空白,只能留下无穷的遗憾^[8]。

明清时期,徽州学术同样取得了骄人成绩。梁启超先生在论及中国学术思潮时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9]而这四者中,与徽州学术人才的贡献相关联的即有一半。明清时期,影响全国学术发展和变迁的两大学派均出自徽州,即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因此,徽州的学术人才当以理学家和朴学家群体作为杰出代表。新安理学自南宋至清初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众多理学家,以致于“先儒名贤比肩接踵”,普通百姓中“肩圣贤而躬实践者”也多也。《新安学系录》中共记录了112位著名理学家及其著作。其中,元明时期新安理学家中的杰出人物,有程大昌、许月卿、程复心、程逢午、程瞳、郑玉、赵沅、胡一桂、朱升等人。清代学术的主流群体是乾嘉学派,而

产生于徽州的皖派经学高居乾嘉学派之首,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称:“国朝经学,首推徽州。”^[10]徽州经学居当时全国之首,乃学界公言、古今共识。皖派经学的标志性人物是休宁的戴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提及:“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11]章炳麟论清代大儒时,特别推重戴震,他在给吴承仕的信中言:“学问之事,终发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泉耳。”^[12]

新安医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13]。新安医学家根据徽州地理环境、气候特征、生活习性,提出了一整套辩证的治疗学说,尤其重视脾胃、肝肾和气血的调养,世人称之为“新安医派”。新安医学自宋代肇兴,伴随着徽商而崛起,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新安医学家著述丰富,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2200种左右的医籍中徽州版医书达到270种^[14]。其中以明清时期名医和著作最多。据专家考证,新安名医明代153人,医著153部;清代452人,医著292部。明清徽版医籍250多部,155种。其中医典25种,基础理论24种,本草方论42种,临床各科42种,医案7种,丛书15种^[15]。除此之外,明清徽州还有很多医学人才,人数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区域,并且形成了“专科齐全,世代相传”的“家族链”和“师承链”的特色,学有所传、业有所承,至今不息。

除了以上比较突出和集中的人才群体外,在艺术、建筑、文学和科技等领域内,明清徽州也是人才济济、成绩斐然。遗留至今的“古三雕”、徽州园林、徽派版画、徽派篆刻、新安画派、徽菜等文化艺术成果,无不昭示着徽州人才的匠心独运和聪明才智,为传统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世界艺术宝库增添了中华地域文化的特色。

2 明清徽州人才兴盛之原因

2.1 宗族是明清徽州人才兴盛的组织保证

唐宋以降,伴随着中原世家大族的迁入,徽州成为中国一个极为典型的宗族区域社会。徽州宗族大多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一向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宗族所信奉的观念成为明清徽州人才辈出的坚强组织保证。在明清徽州社会中,盛行的传统观念是,宗族成员的个人素质是决定宗族兴衰荣辱的关键。正如宗谱中所述:“盖一姓之人才,一族之盛衰系焉。”出于强宗大族的终极关怀,明清徽州宗族在培养人才方面采取了以下几种

1 王德藩.绩溪盘川王氏宗谱.民国10年(1921年)活字本.卷4题名并引。

措施。

首先,重视蒙学教育。徽州宗族对蒙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如“子弟在妙龄时,嗜欲未开,聪明方起。譬之出土之苗,含华结果,全赖此时栽培。灌溉得宜,以资发荣”¹。“家之兴,由于子弟贤;子弟贤,由于蒙养裕”^④等观念深入人心。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几乎都设有义学、塾学、书屋等公共教育机构,如清代黟县南屏叶氏宗族就建有梅园家塾、南屏书屋、西园书屋、应奎堂书屋等教育机构多所^(四)。

其次,大力创建书院、倡导文会。书院是“古代的大学机构”,文会类似于书院,有的兼有社团性质,两者都是成年士子们作文为主、研习八股时艺的教育场所。明清徽州相当一部分书院和文会是由宗族兴办,都是以培养宗族人才为宗旨,例如,婺源胡氏明经书院原为元朝胡氏十四世子孙初建,“以教养其族,后毁于兵,明朝其二十一世孙“慨思兴复之,族之人亦协课捐资以应之”^{1/4}。《篁溪书院文会簿》中记载,文会建立后,族人期望“将见吾族由此人文日新,簪云集,直上为邦国之光,奚仅闾里之荣乎哉”^{1/2}的美好期望。

再次,旌表树立功名牌坊,营造重视人才的氛围。徽州是中国的“牌坊之乡”。明清时期,徽州的城乡到处耸立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牌坊和牌坊群。据方志记载,康熙年间,休宁县有牌坊145座;嘉庆年间,绩溪县有牌坊91座;清末,婺源县有牌坊155座;歙县,现保存下来的牌坊仍有近百座。明清时期,徽属六县的牌坊数当在千座以上^{[4]179-189}。在这些众多的牌坊中,又以“高爵甲科居大半”,即大多是“世科坊”、“进士坊”、“状元坊”等科举功名坊。这些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科举功名的纪念碑。徽州人给中举入仕者“树坊表于其乡”,其目的是营造出浓郁的崇儒重仕的社会氛围。

2.2 徽商是明清徽州人才兴盛的经济基础

徽州人才之所以如此兴盛,是以当时徽州经济的繁荣昌盛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的繁荣,人才的昌盛便无从谈起,即所谓:“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1/4}而徽商对明清徽州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所以说徽商的成功铸就了徽州人才的辉煌,实不为过。

“贾而好儒”是明清徽商的一大特色,因此享有“儒商”的美名。出于“亢宗亢族”和对士子们业儒入仕的终极关怀,徽商们积极投身家乡和侨寓地的教育投资和人才培养。徽州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均与徽商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亟置塾学、广设义学、捐修官学、倡建书院。在鼎力办学的同时,慷慨资助士子

的束脩膏火,并且围绕科举考试对士子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在徽商的资助中,尤其以书院的束脩膏火最为突出,以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例,府属紫阳书院,乾隆末至道光初的膏火来源:先是依赖徐士修所捐银12 000两;后歙商鲍志道又捐银8 000两,“添补经费”;继之歙商“程光国暨其子振甲董理其事,逐年捐资添补以给支销”;往后,鲍志道之孙鲍均又捐银5 000两,黟县绅商又捐银11 000两等^⑧。

除了对家乡教育投资和人才培养倾注了无限热情外,明清徽商在侨寓地也积极兴学以培养人才。雍正间,祁门盐商马曰瑄重建扬州梅花书院,“前列三楹为门舍,其左为双忠祠,右为萧孝子祠;又三楹为仪门,升阶而上,为堂凡五重,复道四周;又左为讲堂,亦五重;东号舍六十四间,旁立隙宇,为庖厨浴溷之所”⁽⁴⁾,并延名儒主讲其中。此外,大家已耳熟能详的书院,如明杭州紫阳书院、尊文书院,清汉口紫阳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景德镇紫阳书院等,也都是徽商出资倡建的。

2.3 教育是明清徽州人才兴盛的智力支撑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尤其发达,正如史载:“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⑩作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徽州,人才之兴盛的背后是教育的发达作为坚实的智力之撑。

在徽州宗族和徽商的眼里,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如明休宁人张习孔在《家训》中所说的:“书香不可绝。书香一绝,则家声渐垮于卑贱,则出入渐鄙陋。人既鄙陋,则上无君子之交,下无治生之智。……猛念及此,安可不教子读书。”¹⁰清光绪绩溪冯氏家谱中特列“兴文教”一条,所言“一族之中,文教大兴,便是兴旺气象。古来经济文章无不从读书中

¹ 章乔,绩溪西关章氏族谱,万历刻本,卷36师说。

^④ 江志伊,乾隆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民国15年(1926年)石印本,卷首江氏蒙规。

^(四) 叶有广,黟县南屏叶氏族谱,嘉庆17年(1812年)木活字本,卷1书馆。

^{1/4} 程敏政,篁墩文集,四库全书本,卷15婺源胡氏明经书院重修记。

^{1/2} 率溪书院文会簿,抄本,原件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1/4} 沈珪,落帆楼文集,民国7年(1918年)刻本,卷24别集·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⑧ 民国歙县志[M],民国26(1937年)刊本,卷2营建志·学校。

⁽⁴⁾ 李斗,扬州画舫录,同治11年(1872年)重印本,卷3新城北录上。

^⑩ 道光休宁县志,道光3年(1823年)刊本,卷1风俗。

¹⁰ 张潮,檀几丛书[M],清康熙新安张氏霞举堂本,卷18家训。

出。草野有英才,即以储异日从政服官之选,其足以前人光、遗后人休者。”正因对教育是培养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徽州宗族和徽商都积极倡导和投身到徽州教育中来。

明清徽州学校教育的发展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明清时期的徽州“族必有学、家必有塾”。明朝建立之初,洪武八年,朱元璋下令全国建立社学。同年,徽州六县“于邑之坊都,居民辏集之处”;共设立社学462所,其中歙县112所、休宁县140所、婺源县140所、祁门县27所、黟县13所、绩溪县30所^④。社学衰落之后,清以后塾学成为徽州基础教育的主体机构。民国初年曾有一份资料显示,直到1930年代,私塾仍在安徽乡村普遍存在。据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安徽全省私塾14388所,在农村教育中所占比例高达73.1%,位居全国之首^[16]。而绝大多数私塾都集中在徽州地区。除了初等教育的发达,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也十分兴盛。明清徽州书院的发达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其与学术传播的紧密结合以及学术人才的繁荣上。自明至清末,“朱学”、“心学”、“朴学”相继登上徽州书院的讲坛,打破学术单一的局面,促使了人才培养的创新。

由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个“十室九商”的商贾区域,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教育的发达中又多了商业教育的特色。除了口耳相传和编写“商业书”对子弟进行商业实用知识的教育外,明清徽商还注重对子弟商业道德的培养,尤其是“义利观”的塑造。张海鹏先生曾将徽商的商业道德总结为四点:“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49]。这些商业道德体现出的行为特征即是徽商在经营中不贪、不欺、不诈,遵循持价平实、讲求诚信、注重质量的廉贾之道。商业知识和商业道德的教育,使得徽州商帮呈现出与其他商帮不同的优质特色,成为“儒商”的典型代表。

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大大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直接造就出大量的人才,形成了明清徽州地区“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的盛况¹⁴。

3 结语

明清徽州人文荟萃,“商成帮、学成派、名人成群”;涌现出大量各类人才。史载:“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枝,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即汪道昆)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

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先生大称赏而去。”¹⁶人才的兴盛又促进了徽州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繁荣发展。明清徽州虽为商贾世界,徽州人却并非在商只言商、只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徽州宗族、徽州商帮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促成了人才的兴盛,各类人才源源不断的涌现又促使徽州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徽文化。

参考文献:

- [1]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缩印本[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302
- [2] 辞源: 第一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58
- [3] 黄轶球. 广东的文风与人才[J]. 文会丛刊, 1948(1): 1
- [4] 李琳琦.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5] 范金明.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2): 171-172
- [6] 沈登苗. 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 中国文化研究, 1999(26): 60-62
- [7] 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1: 74
- [8] 王世华. 双子座: 徽商、晋商比较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3(6): 642
- [9]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11
- [10]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1087
- [1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4
- [12] 章炳麟. 论学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347
- [13] 余瀛鳌. 新安医籍丛刊[M]. 合肥: 安徽科技出版社, 1990: 1
- [14] 童光东. 明清时期徽版医籍刻印及其影响[J]. 中国医药学报, 1990, 5(4): 61
- [15] 李济仁. 大医精要: 新安医学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
- [16] 郝锦花. 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

(责任编辑: 周博)

¹ 冯景坡. 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 光绪23年(1897年)活字本. 卷上冯氏家训10条。

^④ 弘治徽州府志. 弘治刻本(1997年齐鲁书社影印). 卷5学校。

^[49] 前三条见张海鹏《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后一条见张海鹏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79页。

¹⁴ 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 道光7年(1827年)刊本。

¹⁶ 张潮. 昭代丛书. 道光刻本. 甲卷24歙问小引。